学术专论

乾隆朝引见文官籍贯、出身及相关问题分析*
——兼与雍正朝引见文官比较

王志明

[摘要] 本文通过对乾隆朝引见文官地理分布、职官层级、科举出身等因素的分析，认为政治人材分布越往下层政区越不平衡，京畿和江南是两个最重要的人材核心区域，乾隆朝旗人和杭州府人材地位比雍正朝更突出，笔帖式在乾隆朝更受重用。乾隆朝引见文官的科甲比率总体高于雍正朝，但乾隆朝贡生以下低学历出身者占据中上层职位的比例却高于科甲人员，省区官员的科甲比重与该省区官员比重大致成反比。各项分析表明旗人和京畿区域人材占据选官优势。

[关键词] 乾隆朝　雍正朝　引见文官　地理分布　科举出身　职官层级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1）－02－0041－09

An Analysis of the Native Places, Examination Backgrounds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of Presented Civil Officials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and a Comparison with the Yongzheng Reign

Through an analyses of factors such as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ranking stratifications,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background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geographic origins of officials who had audiences with the emperor became more and more imbalanced from higher to lower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Jiangnan and the capital regions were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core areas for personnel recruitment. Manchu bannermen and officials from Hangzhou prefecture also enjoyed higher status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than during the Yongzheng reign, which the official clerks who were in charge of Manchu-Chinese paperwork received higher priority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The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while the ratio of successful examinees with imperial audience was higher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than during the Yongzheng reign, the middle and upper officials successful from the lowest rank such as *gongsheng* had a higher ratio of success than *jinshi* and *juren*. All the analyses demonstrate that the bannermen and those from the capital areas received priorities for recruitment.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所存乾隆朝引见文官姓名及履历档案约有 42270 余件次，[①]涉及到 16300 余名文职官员（大多数为多次引见或档案重复）。本文试图据此档案资料分析乾隆朝引见文官的籍贯、出身、任职层级等问题，并与雍正朝引见文官相比较，[②]以探讨乾隆朝职官结构特点。

一、引见文官籍贯与任职层级分析

清帝国为维持大一统，很注意平衡各省区的政治人材，使稀缺的选官权力资源分配合

[收稿日期] 2010－11－20
[作者简介] 王志明（1964—），男，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上海 200237

理，同时不同区域和民族的政治人材交互任使也有消解地方帮派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的作用。清政府规定各大政区有额定的举人录取指标，甚至府学、县学也有限定的“学额”，其实质上就是平衡选官资源，因为科举是任官的重要参照系。这类平衡地域选官资源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可以引见官员的区域分布为例来探讨。

进行本项探讨有以下问题须说明：其一是关于籍贯记载的合理性问题。有些科举竞争激烈地区的人材冒籍到它省区应试，往往以冒籍地登记籍贯，但根据各种方志关于本地科举人材的记载，这种违法现象不多见。还有些官员所填的籍贯实际上是祖籍，如乾隆引见官员王守坤，其父为陕西乾州人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其履历所写籍贯“陕西乾州”当是祖籍，但另一籍贯又是“河南南阳府唐县”。[③]又如安徽桐城张氏家族的一些子弟随前辈在京城出生成长，官籍仍为桐城县，方志也将他们列为本地人材。这类现象影响了统计的合理性，在统计时倾向于取户籍所在地。旗人改籍现象很少见，关于旗人的计量较为准确。其二是取样的代表性问题。所用履历资料为一档馆档案，从乾隆初年到末年皆有，以乾隆中期为多，其中984人为雍正朝引见过的文官。在所得16300余名文职官员中，4000余名无年龄、籍贯、迁转等可取资讯（主要集中在《全编》第29册）。可取资讯的官员共有12198名。其中也有极少缺失出身、任职等记录，故在本文各项计量时与此数稍有出入，另见说明。缺失籍贯者，据其任职迁转资讯，查百余种任职地《方志》中的《职官表》，增补到123人的籍贯，共得有明确籍贯的官员12196名，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展开籍贯分析。其三是关于引见官员层级的划分。引见官员基本上是道府以下的地方官员，道府以上的官员和品级高的京官很少。为考察职官权力资源的构成，本文将道府一级正、从四品归为中层官员，凡属四品的学政、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少卿等也归为中层官。四品以上的布政使、侍郎、巡抚等归为上层官，四品以下的同知、通判、知县、郎中、员外郎、主事、给事中、检讨等归为下层官。乾隆朝引见上层、中层、下层官员分别为428人、1786人、9984人，各占引见有籍贯可查总人数12198人的3.5%、14.6%、81.9%。雍正朝引见官员5752人，基本是下层官员，上层31人，中层366人，中上层占9.6%，少于乾隆朝，说明雍正更倾向于引见下层官员。乾隆朝中上层官员平均年龄45.4岁，下层官员平均年龄44.2岁。雍正朝中上层和下层官员的平均年龄是46.3岁和44.0岁，与乾隆朝接近。雍正朝全体引见文官平均年龄44.1岁，乾隆朝44.4岁，乾隆朝官员年龄略大，与中上层官员比例多有关。本处统计以履历年龄为准，履历年龄多是虚报，实际年龄略高几岁。

取乾隆朝引见文官籍贯，并与雍正朝引见文官籍贯比较，以探讨文官区域分布的差距与变迁，将乾隆朝文官分层级并对应籍贯分析，更能显现区域人材的构成特点，表1即是在此意义下架构。

由表1可作以下分析：

其一，乾隆朝各省区人材布局的平衡度与雍正朝相近，乾隆朝略显不平衡。以雍正朝21个省区人材所占百分比计，其标准差为2.9%，乾隆朝21个省区人材所占百分比标准差为3.0%。

其二，以所占百分比计，乾隆朝比雍正朝增长的省区有11个，其增幅降序排列依次为八旗、江西、广东、湖南、云南、四川、山西、安徽、贵州、奉天、广西等。乾隆朝比雍正朝下降的省区有10个，其降幅降序排列为顺天、河南、湖北、直隶、山东、陕西、江苏、福建、浙江、甘肃。其中顺天降幅最大，为2.3%；八旗增幅最大，为2.5%。可见顺天的降幅和八旗的增幅大致相抵。旗人主要集中在京城，顺天府包括京城，可见京城和顺天府一带在雍正、乾隆两朝所占的官员比例没有变化，这一地带的职官权力资源两朝大致相等，但这一地域的旗人和非旗人的比例有变化，旗人的大量任职挤压了顺天府非旗人的任职机会，此涨彼消，八旗的最大增幅是建立在顺天最大降幅基础上的。

其三，从官员层级构成看，中上层职官所占百分比平均值为18.2，其中汉人为14.7，八旗为41.8，远高于汉人。各省区中上层官

表 1　雍正、乾隆朝引见文官籍贯与层级比较

省区	雍正	乾隆	高层	中层	中高层
八旗	578 10.1	1539 12.6	150	493	643 41.8
江苏	638 11.1	1324 10.9	62	253	315 23.8
浙江	554 9.6	1161 9.5	45	196	241 20.8
山东	420 7.3	793 6.5	40	87	126 15.9
江西	285 5.0	782 6.4	19	82	101 12.9
山西	326 5.7	734 6.0	17	97	114 15.5
直隶	397 6.9	690 5.7	15	80	95 13.8
福建	272 4.7	551 4.5	11	40	51 9.3
广东	172 3.0	532 4.4	4	24	28 5.3
河南	328 5.7	509 4.2	13	54	67 13.2
四川	195 3.4	470 3.9	7	24	31 6.6
安徽	201 3.5	465 3.8	11	85	96 20.6
顺天	348 6.1	458 3.8	6	83	89 19.4
云南	149 2.6	378 3.1	4	21	25 6.6
陕西	200 3.5	377 3.1	5	36	41 10.9
湖南	111 1.9	351 2.9	3	35	38 10.8
湖北	247 4.3	351 2.9	8	41	49 14.0
贵州	136 2.4	322 2.6	5	15	20 6.2
广西	116 2.0	250 2.1	2	20	22 8.8
甘肃	55 1.0	107 0.9	1	16	17 15.9
奉天	15 0.3	52 0.4		4	4 7.7
合计	5743	12196	428	1786	2214 18.2

说明：第一列行政区化以《清史稿·地理志》为标准，顺天和奉天府政治地位与各省相同，单独列项，八旗以旗统人，亦与政区并列。第二列为雍正朝引见文官省区分布，单元格下排为该省区人数占引见总人数的百分比。第三列为乾隆朝引见文官省区分布，单元格下排为该省区人数占引见总人数的百分比。第四、五列为乾隆朝高、中层文官数，第六列为高、中层总和，单元格下排为中高层所占百分比。本表以第三列即乾隆朝各省区人数降序排列。

员百分比顺次为江苏（23.8）、浙江（20.8）、安徽（20.7）、顺天（19.4）、山东（15.9）、甘肃（15.9）、山西（15.5）、湖北（14.0）、直隶（13.8）、河南（13.2）、江西（12.9）、陕西（10.9）、湖南（10.8）、福建（9.3）、广西（8.8）、奉天（7.7）、云南（6.6）、四川（6.6）、贵州（6.2）、广东（5.3）。整体看来，官员比重高的省区中上层官员的比例也偏高，在竞争权力资源时有优势，旗人、江浙一带和北方省份占优势，偏远省份明显呈劣势。

由上分析可知，乾隆朝政治人材的地理分布与雍正朝接近，各省区消长的比率不大，变化最明显的是顺天府和旗籍，乾隆朝顺天府的人材比重下降幅度与旗籍人材上升幅度很接近，可推测是旗人挤压了顺天府的汉人选官资源。人材比重高的省区人材构成也占优，高层级比重大。

二、乾隆朝引见文官府县分布与地域构成分析

选官资源由文化教育、科举竞争力、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等多重因素构成。政府难以综合平衡这些复杂因素，这导致各省区的政治人材分布很不平衡，而各省区内各府县的政治人材分布则悬殊更大，因为各省府政权不像中央政府那样刻意平衡辖区内的资源，并且处于高度中央集权统治下的省府也不具备这种独立行政的能力。

本文所涉文官籍贯分布在 259 个府级行政单位（不计顺天府），据《清史稿·地理志》，相应省区的府级单位约有 295 个，即有近 40 个府级单位引见官员为零。1—20 人的府级单位为 135 个，21—50 人的府级单位 66 个，51—100 人的府级单位 24 个，101—200 人的府级单位 29 个，201 人以上的府级单位 5 个。尤其是杭州府的人材数量接近安徽一省的总和，比顺天府、云南、陕西、湖北、湖南、贵州各省区的人还多。兹取 40 名以上的府级单位列如表 2。

据计量，乾隆朝引见文官省内各府的差别情形主要体现在：

表2　40名以上文官府籍表

浙江杭州府	444	直隶天津府	107	江苏通州直隶州	60
江苏苏州府	368	陕西同州府	106	山西解州直隶州	59
江苏常州府	298	四川成都府	106	安徽宁国府	58
浙江绍兴府	209	河南开封府	105	江西赣州府	56
浙江嘉兴府	202	江苏松江府	104	广东肇州府	55
陕西西安府	189	山东登州府	104	湖北武昌府	54
广东广州府	179	江苏镇江府	103	湖北安陆府	54
福建福州府	166	山东兖州府	102	山西代州直隶州	51
江西南昌府	164	四川重庆府	102	云南大理府	50
浙江湖州府	162	山西汾州府	100	直隶宣化府	49
江西建昌府	150	山东莱州府	98	江苏淮安府	47
湖南长沙府	146	湖北汉阳府	98	湖南衡州府	47
山西平阳府	145	江苏江宁府	94	直隶永平府	47
山东济南府	143	广东潮州府	94	山西平定直隶州	47
云南临安府	142	贵州贵阳府	85	四川顺庆府	47
江苏扬州府	135	江西吉安府	83	湖南岳州府	46
安徽徽州府	135	广东嘉应州	75	河南河南府	46
广西桂林府	132	云南云南府	71	河南怀庆府	45
山东青州府	129	山东曹州府	71	浙江宁波府	44
直隶河间府	126	湖北黄州府	67	江西瑞州府	44
山西太原府	124	江西抚州府	66	山东武定府	43
直隶保定府	121	福建汀州府	65	江西饶州府	41
福建泉州府	118	福建漳州府	64	甘肃宁夏府	41
安徽安庆府	115	广东惠州府	64		
河南归德府	109	江苏太仓直隶州	62		

说明：每栏右列为人数，表3同。

江苏省以苏州（368人）、常州（298人）二府人材最集中，扬州、通州和长江以南各府人材1224人，占全省93%，苏北地区人材稀见；浙江省人材集中在浙北，杭州（444人）、绍兴（209人）、嘉兴（202人）、湖州（162人）四府占全省88%，尤其是杭州府人材地位更突出；山东省人材以济南府（143人）、兖州府（102人）和胶东半岛上的登州（103）、莱州（98人）、青州（129）五府人材最集中，占全省73%，胶东半岛三府占全省42%；江西省以南昌府（189）、建昌府（106人）最集中，占全省40%，其余各部相对均衡；山西省人材集中在平阳（145人）、太原（124人）、汾州（100人）三府，占全省50%，南北人材少，以中部的汾水流域人材居多；直隶省河间、保定、天津三府354人，占全省51%，人材集中在顺天府以南渤海湾以西河网密布地带；福建省人材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福州（166人）、泉州府（118人）二府最集中，占全省52%，但沿海的福宁府只有1人，内陆的汀州府却有25人，或是取样有问题；广东省人材明显集中于沿海，广州（178人）府最集中，占全省34%，广州、潮州（94人）、嘉应直隶州（75人）、惠州（64人）、肇州（55人）五府州占全省88%；河南省归德（109人）、开封府（104人）人材居多，占全省42%，其余各府人材较为均衡；四川省人材集中于成都（106人）、重庆（102人）二府，占全省59%，西部广袤地带罕见人材；安徽省以徽州（135人）和安庆（115人）二府人材最集中，占全省54%，北方人材很少；云南省人材以临安府（142人）为中心，临安、云南（71人）、大理（50人）三府占全省70%，其他府县人材稀见；陕西人材集中于西安（189人）、同州（106）二府，占全省78%，而同州府在雍正朝人材地位还不突出；湖南省人材以长沙府（146人）最突出，占全省42%，临近长沙各府人材较多，西部边缘府县人材稀缺；湖北省人材集中于长江东段的汉阳（98人）、黄州（67）、武昌（54人）、安陆（54）四府，以今武汉市为人材中心，占全省78%，西部府县人材稀少；贵州省人材比较分散，贵阳府（85人）占全省26%，各府人材相对均衡；广西省人材以桂林府（132人）占绝对优势，为全省53%，西北部人材稀少；甘肃省人材稀少而分散，以宁夏府（41人）最集中，占全省38%。

由上可见，首府（省会所在府）是人材聚焦之地。因为首府是政权中心，多数还是经济、文化、教育、人口中心。上列18个省区中有11个首府人材居首位，按首府人材占全省的百分比顺序为：广西桂林府（53%）、陕西西安府（50%）、湖南长沙府（42%）、甘肃宁夏府（38%）、浙江杭州府（38%）、广东广州府（34%）、福建福州府（30%）、贵州贵阳府（26%）、四川成都府（23%）、江西南昌府（21%）、山东济南府（18%）。直

隶、云南、山西、江苏、湖北、河南、安徽等7省首府人材不居首位，这些府多不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重中心的聚焦，如江苏苏州府的经济文化地位比首府江宁发达。

县级政区（县、散州、厅）的人材分布也很不均。本文所列人材分布在1213个县级政区，按《清史稿·地理志》所载，相应省区约有1679个县级单位，即约460个县级政区无人材分布。1—10人的县级政区有960个，11—50人的县级政区232个，51—100人的县级政区17个，100人以上的4个。30人以上的县级政区列表3如下。

表3　30名以上文官县籍表

浙江杭州府钱塘	197	福建泉州府晋江	49	直隶河间府景州	37
顺天府大兴	196	江苏扬州府江都	49	江苏江宁府上元	36
浙江杭州府仁和	171	江西建昌府新城	48	江苏镇江府溧阳	36
顺天府宛平	122	山西汾州府介休	47	江苏松江府华亭	36
江苏苏州府吴县	96	江西南昌府新建	46	江苏淮安府山阳	35
浙江绍兴府山阴	83	江苏常州府无锡	46	山东济南府历城	35
江苏苏州府长洲	79	安徽徽州府休宁	45	江苏常州府江阴	35
江苏常州府武进	77	浙江杭州府乌程	45	浙江嘉兴府嘉善	35
安徽安庆府桐城	77	福建福州府侯官	45	浙江湖州府德清	35
浙江绍兴府会稽	74	江西南昌府奉新	45	山东莱州府高密	33
山东青州府诸城	73	江西南昌府南昌	44	浙江嘉兴府桐乡	32
安徽徽州府歙县	69	湖北汉阳府汉阳	43	江苏通州直隶州如皋	32
江苏苏州府元和	67	广东广州府顺德	43	直隶河间府任丘	32
广西桂林府临桂	65	江苏江宁府江宁	41	山东兖州府曲阜	32
浙江湖州府归安	61	江西建昌府南丰	40	江西建昌府南城	32
福建福州府闽县	59	江苏常州府金匮	40	浙江杭州府海盐	32
直隶河间府天津	57	浙江嘉兴府秀水	39	广西桂林府全州	31
陕西西安府三原	57	湖南长沙府湘潭	38	山西解州安邑	31
浙江杭州府海宁州	56	云南云南府昆明	38	云南临安府石屏州	30
江苏常州府阳湖	55	云南临安府建水	38	河南归德府商丘	30
江苏常州府常熟	51	广东广州府南海	37		

人材密集的县主要分布在人材大省，表3所列52个人材大县中，江苏、浙江各有16个和12个，江浙人材大县占全国过半。首县（府治所在县）的人材地位更为突出，情形如同首府。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兴、宛平、钱塘、仁和前四位人材大县都集中在人材最密集的杭州府和顺天府。临桂、桐城二县人材也极具特色。广西人材主要集中在桂林府，而桂林府的人材半数在临桂县，临桂一县人材占全省26%，桂林府和临桂县是占据省区人材比例最大的府县。安徽桐城县既不是安庆府首县，经济地位也比不上徽州府歙县，但官员数量却居全省之首，主要原因是昌盛的文风、强劲的科举竞争力和厚实的官宦家族背景。特别是桐城张姓有29人，姚姓14人，全县过半选官出自两姓。

从全国范围看，政治人材的分布又有东密西疏、南胜于北、京畿江南为最大人材中心、江河湖海沿岸为人材聚集地等特点。以南北分野论政治人材，可将八旗、山东、直隶、顺天、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及安徽、江苏的北部地区计入北方（徐州、颖州、庐州诸府和泗州、六安直隶州），其总数为5420人，占全国12196名明确籍贯引见官员的45%，而雍正朝北方占48%。北方的人材中心在顺天府和直隶省，旗人也主要居住京城，顺天、八旗、直隶官员总和为2687人，占全国22%。南方人材中心为江南地区，杭州、绍兴、嘉兴、湖州、苏州、常州、扬州、松江，镇江、江宁诸府及太仓直隶州的官员为2181人，占全国18%。京畿和江南占全国40%。以同一标准计算，雍正朝京畿官员占全国23%，江南占全国18%，京畿江南占全国41%。可见雍正、乾隆两朝京畿和江南两大人材中心的地位几乎没有变化，但京畿人材中旗人比例大幅上升，江南人材中杭州府的地位突出，这是发生于乾隆朝的变化。乾隆朝南方人材比北方人材的份量略有增大。

乾隆朝与雍正朝相比，政治人材的南北分野、山川形势分野相差不大，但府县级人材比的波动大于省区间的人材比波动，说明社会变化在下层表现更明显些，特别是杭州府人材相对集中现象的凸显，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引见官员的学历构成分析

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相结合，科举所产生的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等不同等级的学历（即功名）是清代官员任职的基本身份，但科举出身等级与选官任职的关系又受到民族、地域等因素的制约。解析乾隆朝引见

官员的学历结构，对探讨乾隆朝的职官权力构成有重要意义。

本文探讨官员出身，先建立这些引见官员的出身结构表，如表4。

表4　引见文官出身结构表

身份		人数	身份		人数
进士（3203人）	博学鸿词	4		廪生	29
	进士	3199		增生	6
举人		4648	俊秀		1
贡生（1941人）	恩贡	5	武科举（6人）	武进士	4
	拔贡	391		武举	1
	岁贡	46		武生	1
	副榜	181	吏员（40人）	吏员	33
	优贡	22		供事	7
	贡生	616	其他（19人）	功臣子弟	1
	捐贡	612		护军	3
	廪贡	58		领催	1
	附贡	9		骑都尉	3
	增贡	1		前锋	2
监生（1705人）	监生	1458		亲军	1
	捐监	21		秋官正	1
	荫生	208		世管佐领	2
	天文生	18		世家子孙	1
八旗学生（176人）	官学生	146		世袭三等男	1
	觉罗学生	1		世袭一等子	1
	义学生	29		闲散	2
生员（243人）	翻译生员	114	笔帖式		150
	生员	82	不明出身		66
	附生	12	总计		12198

说明　“博学鸿词”的优选权与进士接近，归为进士类。“贡生”细目中的恩、拔、岁、副、优为“正途”出身；细目中的“贡生”不明何种类别，多为捐贡；廪贡、附贡、增贡也属于捐贡，系由廪生、附生、增生资格捐纳入贡，捐贡属“异途”。“笔帖式”本身为官职，其为监生、举人等学历出身者归为“监生”、“举人”等类中，未名学历的归“笔帖式”。“不明出身”为未记录出身者，多为进士、举人、贡生以下的低学历者。取学历时采取就高原则，“荫生”中有1进士、4举人归进士举人类，有7名正途贡生仍归“荫生”，因荫生的选官优先权远高于正途贡生。

由本表可知：一，乾隆朝引见文官的科甲（指进士和举人）比例高于雍正朝。雍正朝进士占总人数17.4%，乾隆朝为26.3%；雍正朝举人（不含副榜举人）占总人数30.0%，乾隆朝为38.1%；雍正朝科甲占47.3%，乾隆朝为64.4%。[④]

二，乾隆朝引见文官的正途出身比例高于雍正朝。表中科甲和恩、拔、岁、副、优五种贡生为“正途”出身，计8496人，占69.7%。细目中的“贡生”616人不明何种类别，很可能主要是捐贡一类。这样“正途”官员当在七成以上。以同一标准计算，雍正朝正途出身占55.0%以上。乾隆朝科甲和正途比例的攀升，说明随着科举的不断进展，科甲在选官中的竞争优势日益明显，总体上看“文治”的意味更浓重。

三，在“异途”官员中旗人据有优势。若将细目中的616贡生计入“异途”，“异途”总数为3702人（“不明出身”者都是身份低微者，当为“异途”）。异途中的“八旗学生”、“翻译生员”、“其他”、“笔帖式”为旗人独有，为数459人，占异途总数的12.4%，而且监生和异途贡生中也有不少是旗人。官学生、觉罗学生、义学生是以幼童直接入学，相当于汉人童生这一最低级学历，由表4可见由童生入仕者几乎没有，而旗人这类学生则有176人入仕。[⑤]在低级学历“生员”中，旗人的“翻译生员”也占半数。

若将职官分层对应科甲比例，则下级官员的科甲比例大于中上层官员的科甲比，见表5。

表5　文官层级与科甲比率

	进士	进士比率	举人	举人比率	科甲比率
雍正朝397中高层文官	126	31.7%	38	9.6%	41.3%
雍正朝5355下层文官	874	16.3%	1679	31.4%	47.7%
乾隆朝2214中高层文官	662	29.9%	336	15.2%	45.1%
乾隆9984下层文官	2561	25.7%	4328	43.4%	69.0%

说明：雍正朝的资料来源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官员层级划分标准同乾隆朝。

由表5可知，进士在上中层文官中比率高于中下层，但举人在中上层官员中的比率很低，这导致下层文官的科甲比率高于中上层文官，乾隆朝这一差距更明显。

将科甲对应职官层级，也能反映这一趋向：

雍正朝引见文官中进士1000人，中上层官员126人（其中上层14人），占12.6%；举人1717人，中上层38人（其中上层1人），

占 2.2%；雍正朝科甲出身者中上层文官 6.0%；贡生以下 3035 人，中上层 233 人，占 7.7%。

乾隆朝引见文官中进士 3203 人，中上层 665 人（其中上层 172 人），占 20.8%；举人 4648 人，中上层 336 人（其中上层 63 人），占 7.2%；乾隆朝科甲占中上层文官 12.8%；贡生以下 4346 人，中高层 1197 人，占 27.6%。

以上两组数据都表明举人在分享职官资源时不敌贡生以下的低级出身者，乾隆朝的数据甚至显示进士也不敌贡生以下出身者。雍正帝一直强调用人不讲究出身，在选官时有打击科甲朋党的倾向，特别是将李卫、田文镜这类捐纳出身者委以重任，而乾隆帝对待科甲似乎宽和得多，但以上数据则是反证：雍正朝科甲出任中上层官员的比率稍逊于贡生以下出身者，但乾隆朝这一比率差距高出一倍多。不过从科甲占有总体官员的比率看，乾隆朝比雍正朝又大大提高，由 47.3% 上升到 64.4%。

由此可知，从科甲占全体官员的比例看，乾隆朝比雍正朝更"文治"，但将职官层级与科甲相对应分析，又似与"文治"相背离。乾隆以后大量的低级出身者身居高位，说明"学"和"用"的分离在加速。科甲出身者总体上道德水平要高于非科甲人员，大量非科甲人士人才跻身高位，也加剧了政治腐败。

比较各省区官员的科甲比率，大致有人材越少区域科甲比例越高的规律，如表 6 所示。

表 6 所示旗人的科甲比率明显低下，云贵、广西、四川等边远省份科甲比例最高，该区域的低学历者参与权力角逐的机会更少。旗人低学历者具有法定的权力竞争优势，汉人内部的低学历者并无法定的歧视政策，何以出现悬殊的比率？因为低学历者的权力竞争还需要有捐纳、保举等经济条件和权力社会背景，经济和权力的格局差异导致边远省份的低学历者竞争处于劣势。将表 6 与表 1 相对照，可见人材大省科甲比率低，但中上层级的官员比率反而高；旗人科甲比率最低而中上层官员比率最高。

表 6　各省区科甲比例表

省区	进士	举人	科甲	引见官员	科甲比
云南	69	284	353	378	93%
贵州	65	231	296	322	92%
广西	65	160	225	250	90%
四川	94	322	416	470	89%
奉天	20	22	42	52	81%
福建	167	260	427	551	78%
陕西	132	159	291	377	77%
江西	332	261	593	782	76%
湖南	69	194	263	351	75%
广东	134	259	393	532	74%
湖北	121	127	248	351	71%
河南	155	200	355	509	70%
直隶	162	305	467	690	68%
浙江	429	352	781	1161	67%
甘肃	33	36	69	107	65%
顺天	129	155	284	458	62%
山东	213	274	487	793	62%
山西	196	240	436	734	59%
江苏	403	378	781	1324	60%
安徽	112	129	241	465	52%
汉军	34	140	174	662	26%
满洲	65	146	211	805	26%
蒙古	4	10	14	70	20%
合计	3203	4644	7847	12194	64%

说明　"科甲比"指科甲出身与引见文官的百分比。汉人科甲比为 70%，旗人科甲比为 26%，全体官员科甲比例为 64%。本表以科甲比降序排列。个别引见官员没有出身记录，故此处引见官员总数少数人。

四、旗籍官员的构成分析

八旗具有选官优势，满洲、蒙古、汉军不同民族的旗人职官构成又有区别，详见表 7。

由表 7 可得以下结论：

其一，乾隆朝满洲的选官比重远远大于雍正朝。在雍正朝引见八旗官员有 578 人，其中满洲 89 人，汉军 489 人，满洲官员占八旗官员总数的 15%，[6]而乾隆朝则高达 52%（805：1539）。满官比重的提高，当与满人教育的加强、儒化程度的提高、官场关系网的延伸等因素直接相关。

其二，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较“下五旗”没有显著的选官优势，各旗选官资源大致平衡。八旗各旗人口大致相等，上三旗占八旗人口的比例约在38%，上三旗官员占八旗总数的43%（665：1539）。旗人中上层官员的比例是42%（642：1539），上三旗中高层官员比例是40%（246：665）。由表7，正黄（195人）、镶黄（243人）、正白（227人）、镶白（196人）、正红（170人）、镶红（193人）、正蓝（171人）、镶蓝（144人）八旗的引见文官人数较为接近，这有利于八旗内部的政治和谐。

表7　乾隆引见八旗文官构成

<table>
<tr><th>旗籍</th><th>旗色</th><th>总人数</th><th>高层</th><th>中层</th><th>中高层</th><th></th></tr>
<tr><td>满洲</td><td>正黄旗</td><td>102</td><td>10</td><td>28</td><td>38</td><td rowspan="8">满洲805人，中高层393人，占49%，高层占14%</td></tr>
<tr><td>满洲</td><td>镶黄旗</td><td>124</td><td>14</td><td>40</td><td>54</td></tr>
<tr><td>满洲</td><td>正白旗</td><td>103</td><td>14</td><td>38</td><td>52</td></tr>
<tr><td>满洲</td><td>镶白旗</td><td>112</td><td>14</td><td>35</td><td>49</td></tr>
<tr><td>满洲</td><td>正红旗</td><td>99</td><td>21</td><td>42</td><td>63</td></tr>
<tr><td>满洲</td><td>镶红旗</td><td>87</td><td>13</td><td>38</td><td>51</td></tr>
<tr><td>满洲</td><td>正蓝旗</td><td>85</td><td>14</td><td>23</td><td>37</td></tr>
<tr><td>满洲</td><td>镶蓝旗</td><td>93</td><td>13</td><td>36</td><td>49</td></tr>
<tr><td>蒙古</td><td>正黄旗</td><td>10</td><td></td><td>1</td><td>1</td><td rowspan="8">蒙古70人，中高层25人，占36%，高层占6%</td></tr>
<tr><td>蒙古</td><td>镶黄旗</td><td>12</td><td></td><td>2</td><td>2</td></tr>
<tr><td>蒙古</td><td>正白旗</td><td>9</td><td>2</td><td>2</td><td>4</td></tr>
<tr><td>蒙古</td><td>镶白旗</td><td>11</td><td>1</td><td>3</td><td>4</td></tr>
<tr><td>蒙古</td><td>正红旗</td><td>7</td><td></td><td>3</td><td>3</td></tr>
<tr><td>蒙古</td><td>镶红旗</td><td>8</td><td></td><td>6</td><td>6</td></tr>
<tr><td>蒙古</td><td>正蓝旗</td><td>11</td><td>1</td><td>3</td><td>4</td></tr>
<tr><td>蒙古</td><td>镶蓝旗</td><td>2</td><td></td><td>1</td><td>1</td></tr>
<tr><td>汉军</td><td>正黄旗</td><td>84</td><td>1</td><td>17</td><td>18</td><td rowspan="8">汉军664人，中高层225人，占34%，高层占5%</td></tr>
<tr><td>汉军</td><td>镶黄旗</td><td>107</td><td>6</td><td>26</td><td>32</td></tr>
<tr><td>汉军</td><td>正白旗</td><td>115</td><td>8</td><td>38</td><td>46</td></tr>
<tr><td>汉军</td><td>镶白旗</td><td>73</td><td>1</td><td>23</td><td>24</td></tr>
<tr><td>汉军</td><td>正红旗</td><td>63</td><td>7</td><td>27</td><td>34</td></tr>
<tr><td>汉军</td><td>镶红旗</td><td>98</td><td>3</td><td>29</td><td>32</td></tr>
<tr><td>汉军</td><td>正蓝旗</td><td>75</td><td>6</td><td>21</td><td>27</td></tr>
<tr><td>汉军</td><td>镶蓝旗</td><td>49</td><td>1</td><td>11</td><td>12</td></tr>
<tr><td>总计</td><td></td><td>1539</td><td>150</td><td>493</td><td>643</td><td></td></tr>
</table>

在旗籍官员的身份构成中，笔帖式和包衣是两个极具特殊的因素。笔帖式是官衙翻译人员，皆由旗人充任，本身也有七品、八品官衔。由于笔帖式长于行政，又有官场人脉，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人们多将笔帖式也列为官员出身，归为“杂途”[⑦]。其实笔帖式一职也有由正途出身的（见表4说明）。乾隆朝引见文官中有427人为笔帖式，其中278人有更具体的身份记载，他们中甚至还有进士和一批举人，具体情形为：监生102人，生员74人（其中翻译生员45人，附生1人，廪生1人），举人43人，官学生40人，义学生2人，贡生14（其中副榜3人，拔贡4人，岁贡1人），护军1人，亲军1，进士1人。427名笔帖式中，中上层官员166人（其上层38人），占63.6%，远远高于旗人41.8%的中上层比率，可见笔帖式成了迁升的重要资历。与雍正朝的笔帖式比较，乾隆朝的笔帖式出身又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满人居多。雍正朝笔帖式满人占44%，而乾隆朝笔帖式满人占63.7%（满洲272，汉军136，蒙古19）。其二是笔帖式在旗人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乾隆朝笔帖式占旗籍文官27.8%（427：1539），而雍正朝笔帖式占旗籍文官21.6%（125：578）[⑧]。综上所述，乾隆朝，笔帖式的地位上升，而又以满人为主导。

包衣是满州贵族的属民，但地位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奴仆，在分享选官资源时有一定优势，杜家骥对包衣入仕问题有专门论述[⑨]。乾隆朝引见文官注明包衣出身者有110人，其中汉军83人，满洲27人，以汉军为主。110包衣中进士10人，举人44人，科甲占49.1%，而汉人的科甲比为70%，旗人为26%，可见包衣科甲比率明显低于汉人而高于旗人的平均比率（参见表6及其分析），科甲比率越低越具有选官优势，可见包衣的选官优势高于汉人，但低于旗人的平均值。以职官层级而论，包衣中上层官员31人，占28.2%，而汉人中上层官员占14.7%，八旗中上层官员占41.8%（参见表1及其分析）。可见包衣的政治势力高于汉人，但又比一般旗人低下。

五、结论

据本文的分析，可归结以下主要观点：占据选官权利资源最优的为满人，其次为蒙古和

汉军八旗，再其次为江浙等政治人材大省，边远省区居劣势。这里评判占据选官资源优劣的主要标准是官员的绝对数目、中高层官员之比（与优劣成正比）、科甲之比（与优劣成反比）。若将省区人口因素考虑进来，则边远省区未必都居劣势。历史上的人口统计问题极为复杂，这里取经由曹树基修正后的 1776 年（乾隆四十一年）各省区人口数据⑩，对照表 1 乾隆朝的引见文官总数，以多少人口拥有 1 名官员计，顺序为直隶（含顺天府，15504 人）、山西（16706 人）、贵州（17615 人）、浙江（19264 人）、云南（20857 人）、陕西（21127 人）、江西（23989 人）、江苏（24517 人）、福建（25007 人）、广西（30648 人）、广东（34736 人）、山东（35230 人）、四川（35769 人）、湖南（43453 人）、河南（45571 人）、湖北（46077 人）、安徽（55607 人）、甘肃（147654 人）。旗人主要聚居京城，若将旗人也计入直隶，则直隶官员人口比的优势更突出。旗人人口稀少，在官员人口比上无疑占绝对优势。奉天人材稀缺，于此不计。无论从官员绝对数、官员人口比，还是从中高层官员比、科甲比分析，旗人都居最优位置。

乾隆朝引见文官的地域分布和失衡状态很接近雍正朝，以京师为中心的顺天府和直隶省区域，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区域为南北两大人材中心。在北方人材中心区，乾隆朝旗人官员的比例大为提高，挤压了非旗人的仕途；在南方人材中心，杭州府的地位更显突出。考虑到官员人口比因素，以京师为核心的北方人材中心区域最有权力竞争优势。

乾隆朝引见文官的科甲比率总体上高于雍正朝，但贡生以下低学历出身者占据中上层职位的比例却高于科甲人员，这又背离了“文治”的精神。但贡生以下的低学历者总人数众多，若以学衔总数对应寥寥职位，即多少进士、举人、贡监生中产生 1 名官员，其竞争优势无疑是按照进士、举人、贡监生排序逐一降低。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中下层官员的出身、迁转与国家权力控制》（09BZS014）、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乡居进士与官府交往活动研究》（07JA770011）、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历科进士表》（200410220403001）的资助。

①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版，1998 年。

②雍正朝引见文官的分析参见王志明：《雍正朝引见文官地理分布试析》，《历史档案》，2007 年 3 期，第 41-49 页；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相关章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③见《清史稿》卷 99《王郡传》。《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2 册第 111 页，第 15 册第 784 页、第 788 页，第 18 册，第 485 页，第 488 页。

④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第 356-357 页。

⑤关于旗人的教育与政治关系，可参见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72-386 页。

⑥参见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第 402 页。

⑦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1975 年印行，第 1 册，第 18 页。

⑧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第 404 页。

⑨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 466-476 页。

⑩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703-704 页。